焦点评论

十万旅客滞留考验应急能力

春节临近，每一条回家的新闻都揪动人心。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日前通报，2月1日南下广东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，导致广州火车站和火车东站多趟始发列车循环晚点，致使有近10万旅客聚集在火车站广场周边，人员密度非常高，有个别乘客冒着风雨在广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因连日来北方雪情不断加大，与广东毗邻的多省也出现大范围的冰雪天气，给铁路运输造成不利影响，各干线部分区段列车被迫限速运行。

对那些滞留于广州火车站周边的10万旅客来说，此时他们最望而不得的，显然是那一趟久久不能正点抵达的火车。我不能想象，寒冷的天气之中，风雨交加的广场之上，那些试图回家的面孔，在此刻有着怎样的五味杂陈。唯愿火车能够尽快地到来，让那些焦虑的心情得以缓解。

10万名旅客滞留于火车站周边，乃至短期间可能难以知晓火车具体发车的时间，从物质层面而言，这10万名旅客就是庞大的日常用品消费人群，必将对周边商铺经营带来压力；从心理层面而言，当回家的心理诉求长期不能得以满足，众多旅客很容易衍生出烦躁、愤怒等异常情绪；从社会治安层面而言，大量的人群聚集，则暗藏着社会治安的隐患，很可能发生踩踏事件、安全事故。如何来迅速出台应急举措，加以应对，这是一个考验。

新闻亦有提示，面对火车站地区出现的旅客聚集突发情况，广州警方启用应急指挥机构，启动火车站地区春运安保二级响应，在已投入2600名安保力量的基础上，抽调1300名应急力量投入到火车站地区支援。如此反应速度，不可谓不迅速，但在确保火车站周边的安全之外，应急举措还可以更完善和拓宽一些。譬如，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发布火车到站和开出信息，减少乘客焦虑；譬如，尽量多地设置临时商店，满足乘客日常所需；再譬如，特别关注那些“情绪失控的人”。

直面10万旅客滞留的新闻，我不想去过多抱怨。毕竟迄今为止，回家过年仍是一种无法被改变的习惯。因为回家过年的习惯无法改变，因为运力无法增加，所以春运仍是必须承担和直面的交通压力。我只是希望，我们的制度和机制能够在春运中得以成熟。事实上，大量火车旅客滞留在2008年的冰灾时就有发生，且成为当时令人头痛的春运问题。整整8年过去，我们的应急制度当得以成长，我们当拥有更多的勇气和能力，让旅客即便暂时滞留，也能最终平平安安回家过年。 □王聃

民生视角

阿玛尼少年风波，别忽视两大问题

因为年仅13岁就列席深圳市政协会议，并有“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未来”等提议，一位名叫柳博的初二学生一夜蹿红。很快，网友发现会场上的这位少年身穿奢侈品牌“阿玛尼”西服，其微博也多见身着“阿玛尼”的日常照片，质疑猜忌声四起。

针对质疑，深圳团市委工作人员回应称，作为列席人员，柳博主要是旁听会议内容，不参与正式的会议流程。之所以推荐他，是因为他自身优秀，而且此前参加过全国少代会，有相关的经历。而柳博所提议的“自我管理”、“不要让考卷决定未来”等内容，是他在深圳市两会前举行的“共青团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面对面”的座谈会上提出的，也有一些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的，并非是在政协会议中发言。

据报道，除深圳外，在广东，去年就有青少年列席珠海政协会议，其中一名是14岁的随迁子女，他还曾“提案”：希望所在的民办学校能多设置一些读书角，多建一些电子阅览室，让同学们有更多渠道接受知识。可去年14岁的随迁子女列席两会且“提案”，没有引起网友多大关注，而今年“阿玛尼少年”迅速引爆网络，这种反差令人深思。

网友不太关注随迁子女列席两会，是因为这一新闻没有多少“槽点”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不太可能动用权势力量去弄列席名额，而且列席一次两会，也不会被认为是为未来参政做铺设，虽然也有个别网友质疑这是不是“作秀”，但更多网友在点赞可以反映随迁子女心声；可到了“阿玛尼少年”这里，这则新闻却全是“槽点”：他是不是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？是不是动用权势力量去弄列席名额，为未来铺平道路？未成年学生有什么能力参政议政？

这一事件涉及两方面问题。一是青少年列席两会这一活动，对列席者的遴选是否公平？如果这是一项面向所有青少年开展的活动，那么，所有青少年，不论家庭背景如何，都是可以获得机会的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获得这些机会是不是公平、公正，假如整个过程公平、公正，就不能简单地以入选者的身份、衣着进行质疑。二是青少年列席两会这一活动，与其他社会公平问题“纠缠”在一起，就是这一活动操作完全符合规定，且公平、公正，可是，舆论并不会这么简单地看，因为，现今就连担任中小学学生干部，都有家长托关系。

据此，要消除身份撕裂，就需要从具体事件和整个社会的老百姓公平感知入手。首先，在具体事件上，必须以规范的程序、公开的操作，来确保公平、公正，相对于深圳这次只有一名未成年学生列席两会来说，珠海去年由一些青少年列席两会，就做得好得多，至少代表性更为广泛。鉴于两会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，不但代表、委员要向社会公开，列席人员也应该公开，以接受监督。其次，必须意识到，我国很多具体的事件，引起社会关注，往往并不在事件本身，而掺杂了复杂的社会情绪。像这件事，就会让公众联想到一些富豪、明星被推荐为政协委员，把参政职责，作为了个人的身份和荣誉，消除这些社会情绪，那需要花更大力气，在我国各个领域倡导公平、公正。 □熊丙奇

『补课』 伊鸣 作

热点话题

证券银行里的『官太太』都有谁

据报道，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王保安的妻子霍肖宇正在配合内地司法机关工作，霍肖宇的公开身份为某证券公司副总裁。此前落马的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，其妻子也任职于该证券公司的投行部。此前，国内某商业银行也被曝内设“夫人俱乐部”，包括令计划妻子谷丽萍在内的多位贪官夫人，在里面只领工资不上班。

一些证券公司和银行成了“官太太俱乐部”，早已是金融业内公开的秘密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与金融业的高度管制有很大关系。

中国经济历经数十年改革，大多数领域已完全开放，但仍有少数领域处于高度的行政管制之下，以银行、保险、证券为代表的金融业就是其中之一。在行政管制之下，这些金融行业要想发展壮大，靠的未必是按市场规律办事，也未必是提高自身竞争实力，而经常是依附权力，吃政策饭。

以银行业为例，其重要的一个利润来源就是息差，而要想获得高息差，负债端是关键，即要以更低的利息，获得更多、更稳定的储蓄资金。而这样的储蓄来源中，国企和政府部门是大头。谁能利用官场人脉拉到大笔政府部门和国企存款？这一方面，“官太太”们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，去年媒体曾报道，温州市国资委某官员利用自己分管国企业绩考核、财务管理及国企公款存放选择权，私自为妻子供职的银行提供便利，承揽国企存款，日均存款高达23亿。

证券业也是同样的，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，同样要向权力靠拢。例如，券商要想获得更多优质企业的IPO业务，必须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官员手中的内幕消息，更是一些券商追逐暴利的法宝。2011年高淳陶瓷内幕交易案中，时任南京经委主任的刘宝春，对高淳陶瓷的资产重组了如指掌，而其妻子任职的南京证券同时担任高淳陶瓷此次重组财务顾问。在证券业种种不透明的管制和干预之下，“官太太”们可谓如鱼得水。

所以，“官太太俱乐部”寄生于金融业，从侧面反映出金融业开放和改革的迫切。在此方面，我们已有不少动作，例如银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，证券业金融产品的审批放宽等等。但就眼下看，这样的开放与改革难言彻底，民营银行虽然获批，但经营上还面临诸多限制，证券业牌照仍未放开，行业的竞争还不够充分。

金融是一国经济之血液，金融体系的充分市场化与开放，是经济健康运转的首要前提。金融的过度管制，使得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过高，难以充分享受到现代金融的各种便利，更滋生了“官太太”这样的食利者，这显然值得社会深思。

而也只有放松金融管制，降低银行、证券、保险业进入壁垒，打破国有垄断，加快市场化步伐，才能对“官太太俱乐部”釜底抽薪，让银行、证券业建立更健康的行业生态，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。 □于平

社会透析

大学应从改名的政绩幻觉中清醒过来

“泸州医学院”这名字丢人吗？随便去找个人问一下，也不会有人觉得这个称谓有任何污名色彩。问题是，校方对这个名字就是不待见，非要改个名字换个马甲，结果闹出笑话，而且越闹越大，也让人渐渐笑不起来了。

去年，泸州医学院被改成四川医科大学。结果，这个名字引起“川医”之争，遭到强烈抵制。原因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的前身（四川医学院、华西医科大学）简称“川医”，泸州医学院的改名让人家觉得是在投机，是想沾光，由此引发矛盾冲突。不得已，前些天“四川医科大学”这个只存在半年的名字被改成“西南医科大学”了。

马甲接连换了两回，还是不行。报道称，新的校名“西南医科大学”又引起波澜了。最近，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官方发布声明，要求四川省“泸州医学院”立即停止其不当更名行为，并已通过第三军医大学向国家教育部申请高校更名行政复议。原因是认为这个新校名严重侵害“西南医院”和“西南临床医学院”相关权益，引起了西南医院专家教授、教职员工和广大就诊病人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。

泸州医学院这名字不丢人，丢人的是大学乱更名这件事本身。盲目以为更名就是很有面子，就能带来很大的政绩，完全就是自欺欺人。当然，像这样的大学乱改名，并不是孤例，仅2015年全国至少有18所高校申请改名，大多从学院更名为大学。

出现这种怪现象，既与高校面子思维有关，也是受利益驱动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大学比学院强，学院比学校强。为此，一些高校就想换个听上去更“高大上”的名称来吸引更多生源，甚至借更名来圈更大的地，来拉更多的项目。重面子轻里子，重利益轻教育，如此浮夸，如此功利，也让高校越来越失去人文精神的底色，失去追求严谨治学与求真办学应有的静气。

用“学院”这样的称呼，并不意味着高校的地位和声誉就受损害。比如，在中国，有谁会怀疑“北京电影学院”在相关艺术类高校中的专业地位呢？放眼世界，又有几所大学能有“麻省理工学院”的实力和影响呢？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中国的大学如若不去埋头认真办学，只知道忙着玩改名游戏，就是改成个“东方哈佛大学”，到最后仍然还是个笑话。

大学告别面子工程，摆脱浮躁心理，从改名的政绩幻觉中清醒过来，转向真抓实干风学风，提高教育水平，提升创新能力，这才是真正的政绩。 □单士兵

一部麻雀变凤凰的奋斗史

——评小说《雀儿》中普通打工青年的故事

作家周养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雀儿》属于打工文学之列。一般而言，“打工文学”作品绝大多数出自年轻一代打工者之手，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打工生涯，揭露了自身辛酸的求生之路和奋斗经历。他们的怀乡情结与扎根城市的愿望不时地让内心纠结，体现出城乡二元的对立。陕西地处内陆，以“乡土文学”著称，打工文学并不突出，农民工写自己故事的也不多。贾平凹的《高兴》算是一部比较突出的打工文学，道尽了生存的苦难与无助。周养俊的《雀儿》却有着明亮的底色，讲述了高考落榜的雀儿进城务工，虽然经历很多阻碍艰难，却最终创业有成的故事。作为和雀儿相比较的人物，小说重墨塑造了考进大学的山村女孩百灵，选择了和雀儿不同的人生追求，集中展现了以雀儿为代表的农村青年艰苦创业的精神，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生存所面临的困境。

《雀儿》和其他打工文学不同的一点在于，小说没有停留在个人苦难与悲剧的叙述当中，而且小说似乎还在淡化苦难，力图去超越苦难。文中的人情味很浓，疼痛感很少。她们虽然面临物质的贫乏和事业的挫折，但是并不因此而消沉；她们虽然有精神的漂泊和在情爱中的挣扎，可是没有放弃自我的救赎。感受最深刻的是小说中人物奋斗和追求的历程。通过这种“温情叙事”，对打工女性的形象在当代语境下进行了挖掘，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自尊自爱自强的女性雀儿。同时，也看到了其他打工者在城市的诱惑与压迫之下，所面临的选择与茫然。猫眼的堕落，百灵的不择手段，金凤的利益熏心，都道出城市生活的不易。小说给了每个人选择道路的理由，也让每个人承担了选择的后果。

同时，作品以外来农民工的视角来看待城市，使得文中语言生动活泼，平易而通俗。短小而上口的俚语，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也符合人物的身份。周养俊对农村生活熟悉，对农民工的生活也很了解，语言中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，刻画人物心理细腻而真情流露。阅读中，秦声乡韵扑面而来。我们感受到了西安城中的风土人情、城中的大街小巷及美食小吃、历史古迹和秦腔风韵。总体而言，作者对于陕西民俗文化十分熟稔，对陕西方言的娴熟运用，对陕西人勤奋个性的恰当把握，是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。

而且，在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中表达出强烈的伦理价值倾向，体现出对“真善美”的追求，流露出对底层叙事的人道主义关怀。主人公雀儿既有对传统价值的持守，也有新时代女性的智慧和见识，她是个传统与开明的矛盾体，是个人奋斗的典范，是个接近“完美”的女性。她努力工作，获得老板的认可，开办印刷厂，勤奋写作，成为一名作家。相比之下，百灵为了能留在城市，违心地和大学同学刘有成谈恋爱。当百灵留城的目的达到之后，就断然抛弃了对方。百灵爱上了上司张勇，为了能嫁给他，不惜拆散了他和女朋友琪琪。她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，却遭遇流产，最后在医院的产房中，在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抉择中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可谓恶有恶报。坐台当别人情妇的陕北女孩猫眼，靠青春去换取金钱，尽管中途悔悟，但最终还是抵不过外在的诱惑。金凤为了自己理发店生意好，找来一些卖弄风情的女子撑门面，结果给自己惹上了麻烦。作者通过小说人物之口，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批判。

小说还对打工女性的爱情婚姻观进行了多种呈现。在爱情上，雀儿反对同居和婚前性行为。她持有一种古典的爱情观，这也是导致她爱情受挫的一方面。她完全沉浸在对古典爱情的幻想中，或者说在寻找一份完美的爱情。在爱情上，她是被动和保守的，缺乏青年人该有的热情和激情，让人觉得这个新女性有点“陈腐”之气。而百灵是主动的，而且“爱憎分明”，尽管百灵的爱自私自利，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她可以献身，不爱一个人可以选择离去，爱上一个人可以耍尽手段。菲菲因为家庭贫穷，父母亲为她安排婚姻，她像其他农村女孩子一样，早早结婚。对她而言，是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和勇气的。她违心地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，婚后遭受的种种不幸，使她逃离了农村，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。还好在小说的结尾处，给雀儿不幸的爱情留下了温暖的“开始”，米粮始终伴随在雀儿的奋斗过程之中，总是在雀儿最落魄的时候出手相救，因此可以想象她与米粮之间的爱情会开花结果。

《雀儿》值得商榷的地方：

小说在细碎生活中展示主人公雀儿的性情，有些过于分散，人物的形象不是很丰满。如果能抓住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主要围绕雀儿的事业和爱情来写，会更集中也更吸引人。而且，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，比如雀儿担任业务副总经理的事情，雀儿加入作协的事情，雀儿、二强和何眉之间的感情纠葛，小说中又写得有些简略，这样使得矛盾处理比较简单，作品中关于百灵的部分，就只围绕着百灵找工作和寻找爱情婚姻的过程来展开。虽然她不择手段，但是让人觉得鲜活真实，也更记忆深刻。 □韩红艳

新书鉴赏

《偏方》：给乡愁寻找一条出路

《偏方》是媒体同仁安康日报社吴昌勇先生抒写乡愁的散文集。

初看书名“偏方”两字令人感觉怪异，明明是医学名词，作者为何偏偏拿它做了散文集的名字。继而翻看目录浏览文章标题，发现绝大数都是三四个字，如《老屋》、《写对联》、《杀猪匠》、《两掺面》等等，对于陕南的读者而言，似乎平平常常，然而耐着性子读过一两篇之后，却慢慢让人从心底渗出了一种“貌不惊人而内在丰富”的深刻感受，由是勾引得人放不下手，移不开眼目。在异乡的深夜，随着他的笔墨所到之处，让我看到了我的童年，看到了我的乡亲，看到了现在再也看不到的故土上曾经快乐的生活。虽然昌勇写的是他的青少年生活、他的乡土、他的乡亲，但让我感同身受而又无比欣慰，他用心写出来了，且写得美好。从这个层面上讲，与其说这部散文集是他青葱岁月里的生活实录，还不如说是他写给乡村的一部史诗。

乡愁是令人心痛的，但也是美好的。而有了乡愁后我们该如何对待乡愁，如何来为乡愁找到一个出路，昌勇给予的出路在他的“偏方”中，我所看到的是心存美好和感恩生活，包括感恩生命里曾经遇到的所有人、事、物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频繁流动，怀有乡愁在今天已成为某种社会“流行”。集体乡愁还将继续存在，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，而个体的乡愁或轻或重并在很多人心底形成的情结，亦不会立刻消除，也无法完全消除。因而，给乡愁寻找一条出路，不仅是这个时代人们需要的精神关怀，也是文化工作者应该持有的一份社会担当。昌勇在抒写个体的乡愁中无意于履行这份担当，却事实上完成了这份担当。他让乡愁有了一个可以触摸的载体，有了一个可以引起情感共鸣的精神乐园。我以为，这便是《偏方》的价值和贡献之所在。 □杨志勇

秦风书话

读书贵有疑

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儿时读《孟子》中的一句“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”，再看朱熹的注释：“褐，贱者之服，宽博，宽大之衣。”他十公纳闷——因为生长在南方，遇见的“衣褐者”多是富贵之人。“名虽褐，而实则绒（细羊毛织品）也。”于是，他向老师质疑：“褐乃贵人之衣，胡云贱者之服？既云贱矣则当从约，短一尺省一尺购办之资，少一寸免一寸缝纫之力，胡不窄小其制反宽大其形，是何以故？”老师默然不答。再询，则顾左右而言他。李渔颇感失望，疑问数十年未解。直到远游塞外，才终于揭开谜底：原来塞外天寒地冻，牧民自织牛羊毛以为衣，皆粗而不密，其形似毯，所以“人人皆褐”。可是牧民为什么不知节约物力人力，一律穿那“宽则倍身，长复扫地”的“毯”式服呢？原来这种服装是日当蓝衫夜当被的“日则披之服，是夜用以为衾，非宽不能周其身，非衣不能尽覆其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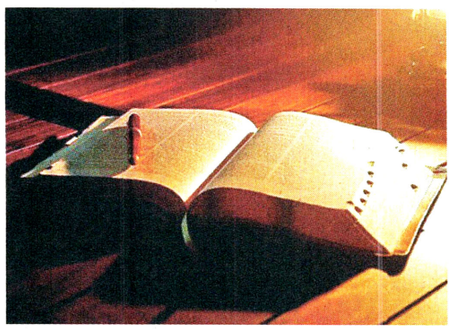
这应是“学贵疑”的很好事例了。读书做学问，难免会遇到许多的疑难，自古以来，人们就很赞赏勇于提出疑问的精神，认为“会读书，当先要会疑，于不疑处有疑，方是进矣。”怕的不是有疑难，而是终日读书没有疑问——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，是不会有进步的。

有疑难就会想方设法去破疑释疑。学问学问，当然是既“学”且“问”的。“问”是钻研，是“学”的深化；只“学”不问，容易埋进死读书、读死书的昏庸里。“问”是知识长进的一种方式，无所谓“羞耻”之意，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“惑而不从师，终为惑矣”。

惑能从师，固然是好事，但做学问终须自己动手动脑，才有所得，否则我们便与留声机无异了。进一步说，读书做学问，不能只当翻译家，而当有自己的思考和见地，这就是善于思考，思考才能有所启发，有所得。“始当求其所以入，终当求其所以出”，是谓知其然，还应知其所以然。古人说“学而不思则罔”，“学贵心悟，守旧无功”，都是经验之谈。思考可以明智，可以捷才。更进一步说，读书做学问有一个知识转化的问题在里头，知识转化为能力，转化为学问，才能集大成，成一家之言。

古人读书尚疑贵思，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传统，值得我们继承。在这个浩瀚的世界中，一定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还未能了解的，思考与质疑的脚步一刻都不能停滞。那种食而不化，只读书而不求甚解的做法，潇洒是潇洒，只怕未必能于学问有所长进。 □胡忠伟

我与书



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